

我者與他者

許倬雲

中國歷史上的

許倬雲 著

我者與他者

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中文大學出版社

特別鳴謝：范家偉博士

《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許倬雲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62-996-390-3 (精裝本)
978-962-996-415-3 (平裝本)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press.com

Who Am I? Who Are the Others? (in Chinese)

By Cho-yun Hs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90-3 (Hardcover)
978-962-996-415-3 (Paperback)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山風雨晦，長河萬古流

迎第一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講者許倬雲教授

梁元生、黎明釗

一

2006年余英時教授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號稱「諾貝爾人文獎」的「克盧格獎」(John W. Kluge Prize)，消息傳來，中外人文學者，拍手共慶，咸稱實至名歸。蓋余英時教授為著名歷史學家，學問淵博，著作等身，是當世華人學者之表表者。余教授畢業於新亞書院，後負笈美國，1962年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至1975年余教授回香港期間，曾任新亞書院校長及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之職。多年來一直擔任歷史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顧問委員，和中文大學關係密切。現今余教授是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

新亞書院為表揚余英時校友的崇高成就，建議聯同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推動中

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每年由兩院合邀一位世界級著名歷史學者來港，舉行至少兩場的公開講座。

二

第一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講者，是許倬雲教授。許倬雲教授與余英時教授同齡，也同樣是世界知名、著述豐富的歷史學者。兩人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國教學及研究多年，而治學又同樣包容中西、兼治古今，識見宏大，洞察深邃、分析細緻，為同行所欽佩。尤其是兩位學者除了有傑出的學術成就外，同樣對於民族文化、家國情懷，都有莫大的深情和眷戀，處處流露在筆鋒之間。單從《風雨江山》和《萬古江河》這兩部書的名字，便足以窺見許教授對中國土地和歷史文化的用心。江山風雨如晦，歷史長河奔流，余教授和許教授對學問追求，竭而不息；對文化視野，開拓遠大；對民族生命，關懷備至，長抱憂思。第一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能夠邀請到許倬雲教授蒞臨演講，真是最為適合不過的了。

三

許倬雲教授，江蘇無錫人，1930年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中學就讀於無錫輔仁中學，承襲了江南無錫「讀書切實、做事認

真」的學風傳統，致力研讀同鄉前輩錢賓四先生的名著《國史大綱》，私淑錢先生的學養方法，這對其日後的史學根基與治學態度有很大的影響。1953年及1956年，許教授先後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隨即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在台大就學期間，許教授從學於李宗侗、李濟之、董作賓、勞貞一、凌純聲、芮逸夫及沈剛伯諸先生。在這些名師的教導下，奠定了深厚的治學基礎。1962年他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1962–1967）、研究員（1967–1970），並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1962–1970）及教授（1965–1970）。1970年應聘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教授，1983年榮任該校校聘之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1980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選為 Phil Beta Kappa 榮譽會員。1989至1995年，榮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其後又曾受聘為美國夏威夷大學、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講座教授。

四

許倬雲教授學問淵博，既博通中華五千年文化，及專精周秦漢三代的歷史，同時又擅長應用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歷史。許教授的著作極為豐富，包括英文專著三本，中文專書三十多部，中英

文發表的論文過百篇。在他的自選集中，¹ 他說其著作可分成三類：

- 一、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
- 二、是考古學；
- 三、討論中國文化發展的文章。

他的三部專書：《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漢代農業》(*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和《西周史》(*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可以代表他在研究西周文明及秦漢政治、社會、經濟等的成果。探索中華五千年文化的著作就更多，從《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到《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到近年出版的《萬古江河》，整個中國文化的開展與轉折都能夠在他的著作中勾勒出來。許教授說：「歷史的演變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規律，卻仍有若干找尋的軌跡。」² 這幾部大作就是他追尋中國文化軌跡的重要成果。

¹ 許倬雲，〈自序〉，《許倬雲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1。

² 〈序：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若干省思〉，見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貳拾柒。

周朝到兩漢是許教授歷史研究的核心。他探討的課題環繞著政治結構、地方力量和農業經濟。周是中國古典文明完成的時代，也是傳統兩千年文化的基礎和泉源；漢是傳統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形成的時期，二千年來政治社會的基本骨架在乎其中。所以這兩個段落是了解中國歷史基本性質最重要的環節。許教授曾說，他的研究範圍牽涉到三個時期，一是形成期 (formation)，一是定型期 (crystalization)，一是轉變期 (transformation)，前者見性格的發展方向，中者是特殊個性的定型，後者則為過渡的過程。這三個時期的研究，體現在許教授三種主要的專著中：《西周史》主要探討以文化為概念之華夏民族的形成期；《先秦社會史論》則討論古代世界過渡到普世國家 (universal state) 和普世文化 (universal culture) 的過程；《漢代農業》更進一步分析維持中國這個普世國家兩千餘年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結構。

五

許教授的歷史論著主要探討中國歷史上兩大課題。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社會力量的衝突和融合，二是農業與商業，亦即城市與鄉村的互補與聯繫關係。而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指出親緣團體、精耕細作與文官制度為構成中國歷史發展的三原色。關於第一原色，許教授認為中國異於兩河流域的文明，他們以地緣

結合人群，而周代則選擇以血緣來結合人群，中國的政治團體、地方組織基本上是以親緣的團體而擴展的。

精耕細作是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它與市場經濟如車之兩輪，相輔並行。許教授認為中國農村並非遺世孤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而是坐落在更廣大的市場網絡的小環節；透過網絡的接連，各環節互通聲氣。小網絡結集於小鎮，大網絡則以城市為綱。大小環節既有生產與消費的關係，疏通的網絡自然就產生物品與人力的調節作用。因此，商業未必是壓迫農業的罪魁，城市也未必成其為剝削鄉村的禍首。

許教授強調的另一個中國文化的基因特色是文官制度（bureaucracy）。中國的文官組織來源久遠，完備而複雜的文官系統理論早在《韓非子》中就出現了。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文官制度是國家與社會鬥爭中的制衡角色。中國的文官制度不僅是工具性的合理，而且有儒家意念摻和其中，這是韋伯（Max Weber）在討論西歐自十六世紀以來的文官制度中所缺少的一環。儒家意念如果只當作意念系統，可能會成為教條，任何東西若變成教條就會神秘化，走上信仰的途徑，而不走理性辯論的途徑。儒家意念之作為目的而論，也可以相當基督教意念，是一種信仰，但儒家的意念卻不是天的神諭，而是經世的使命。

六

有人說成家的學者都不願把金針度與人。探析史料，是歷史學者基本的訓練。怎樣把紛雜的史料爬梳，勾勒架構，條理不紊地鋪排出來卻最容易難倒莘莘學子。許教授擅長運用西方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問題，他的成名作《先秦社會史論》就是應用社會流動的概念來辨析春秋戰國的變革。他指點學子注重與檢討韋伯、S. N. Eisenstadt、William Skinner、Charles Tilly、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理論，這正是「金針度人」之舉，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是生硬地用理論來演繹，而是以豐富史料為基礎，嚴密的論證來分析問題，方法既一目了然，又融會理論，貫通百家，不著痕跡。

許教授積極推動應用不同科際的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的發展，考古學就是他學問的核心之一。他曾多次說古代史研究與考古學密不可分。在他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前院長張忠培教授的大力推動之下，1997年、1999年和2003年，他們聯袂主持了三次考古學會議。³ 前後與會的中青年學者逾百人，會議後還結集了

³ 第一次是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舉辦了「中國考古學研討會——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第二次是1999年，許教授促成了中文大學歷史系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學會一起在北京西陵舉辦的考古學研討會。第三次是2003年，繼前兩次會議，許教授又促成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討論會。

三本論文集。⁴ 許教授積極推動考古學界中青年學者探討人類歷史的演化。由於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取得的豐碩成果，超越研探古器物與古文字研究的範圍，建立了整套的層位學、類型學的研究方法。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文化區系類型的理論和觀念，進一步突破研究個別文化遺址的樊籬。中國文化分區的文化多元論，在中國廣為學界接納，許教授更進一步探討區域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與分合。中國古代文化整合的過程，由聚落擴及當地中心 (local center)，進而邁向地區的中心 (regional center)，三者互相依存的層級關係，演化為複雜的政治體系。許教授在他的〈另類考古學〉一文中總結以空間為主題的地區研究說：

這一思考的方式，可以是演化的 (evolutionary)，也可以是傳播的理論。其實，多線平行的演化論，即已容納了傳播的擴散效應，及相應而起的躍進效應。一個資源領域與另一資源領域相接觸，經過交流而致融合，其間互相的影響，會改變演化階級的發展的速度，及發展的方向。在一個領域的文

⁴ 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張忠培、許倬雲主編，楊晶、黎明釗助理主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1999年西陵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及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楊晶助理主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化，與另一領域的文化相融合時，新的文化綜合體，已不是原來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其中有若干領域的文化，會急劇轉變，經由涵化程序，轉變了發展方向。這一發展過程的複雜程度，與其當時情況的組織複雜性也有互應作用：越是複雜的系統，其系統平行的發展方式，也越有多樣的可能，經歷的過程；也有越多的曲折。在人類歷史之演化的程序，其實從未是直線的進行過程。人類的群體，不斷在組成、接觸、重組，於是社群與社區，都不過是長程演變中的一個階級。地區性的考察，只是對於這些暫時出現的階段，從空間與生態兩方面，尋求其當時當地的情況而已。

他的研究並非止於區域，而是推及全球文化圈之間的交往，人類文化透過他曾說過的「接觸→衝突→交流→適應→整合」五個延續階段而不斷演進。許教授是一位醉心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從他的著作目錄中看到，以文化為題的書名就有《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等等。即使不以文化為題，我們以他的「歷史分光鏡」來解構，其實也是隱藏著以文化為研究核心的。

許教授在臨近退休之年，曾經說過他有一個計劃，就是要寫

一本中國文化史的大著。當時我們期待一個以歷史學為本位，旁及社會學、政治學、考古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等輔助學科的學者，以宏觀、廣博的精神，通古今之變的視野，勾勒中國文化的開拓與轉折。2005年，他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終於面世，這部書上通中國文化的黎明時期，下及亞洲多元體系的中國，以至在世界體系的中國都涵蓋貫通，最後一章中國的「百年蹣跚」尤令人感到欷歔。讀其書想見其人。精湛的見識，豪邁的筆觸，處處流露深厚的感情，許教授是一位真正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溫情和敬意的學者。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自林聰標、劉石吉執筆，〈迎許倬雲教授到新亞書院講學〉，收入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柒—貳拾捌。

目錄

江山風雨晦，長河萬古流（梁元生、黎明釗）	ix
引言	1
1 史前時代	5
2 殷商時代	9
3 周代封建的天下	11
4 戰國時代的列國體制	23
5 中國世界的形成	33
6 漢代的中國	39
7 帝國系統的衰變	45
8 族群「主」與「客」的轉化	51
9 「我」、「他」的大混合	57
10 唐代的中國	65
11 宋代：列國體制下的中國	73

12	蒙古的時代	85
13	明代中國	97
14	滿清帝國	109
15	近代的變化	119
16	國共兩黨的中國	131
	後論	139
	許倬雲著作目錄	143

引言

這一本小書是從一次講演引發的。2007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與新亞書院合辦、中大歷史系協辦「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第一次講演，我應邀擔任講座。第一講裏討論中國地區，幾個史前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年時，發生歷史重大變化。第二講是討論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中—外」關係模式。這兩次講演相關，但並不處理同一深處。這本小書，則是由第二次講演所涉及的項目，延伸其內容，補充了當時應予陳述，而未曾有時間處理的觀念。我可以只將原來講演的錄音稿修改潤色，作為講演記錄。但是，那一小時的講演，實在留下了許多應說而未說的漏洞，我自己覺得有責任補足缺失，庶幾不致太過簡略疏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更支持我乾脆寫書，以代替原來的講演錄音稿。學術工作，本來即不應當因陋就簡。於是，我決定在甘女士承諾的「一本小書」範圍內，交代對於「中—外」關係的一些淺見。

所謂「中—外」關係，若從日常語言的含意看，當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系統，在面臨「他者」時「自—他」之間的互動。但是，中國的歷史，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歷史而已；中國文化系統也不是單一文化系統的觀念足以涵蓋。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抑或文化性的綜合體，「中國」是不斷變化的系統，不斷發展的秩序，這一個出現於東亞的「中國」，有其自己發展與舒卷的過程，也因此不斷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另一方面，在商周以後，掌握文字紀錄及擁有豐厚資源的「中原」自認為中心，視周邊各處為外地邊陲。於是，這一「自—他」的相對地位，又具有「中心—邊陲」的互動。「中心」不斷因為擴張而改變其範圍，於是「邊陲」的所在，也不斷有相應的變化。舊日的「邊陲」，可能融入「中心」，而於周邊，又有原本遙遠的地區，成為新的「邊陲」。同時，若因為有時由不同的地區掌握了權力與資源，「中心」的所在，隨之轉移，則「邊陲」的所在也會為之轉移。又因「中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其地理空間，由交通路線，構成多重網絡，幹線所經，易於聯接網絡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經，即離核心隔了一層的「轉接」，遂與幹道所經之處疏遠。遺留在道路網絡之外的空隙之地，則又疏遠了一層。上述「疏遠」的意義，不在空間距離的遠近，而在資源與資訊的輸送所至，決定其在網絡上的位置，因此，網絡上會有另一形式的「邊陲」，離核心的空間距離不